

山西
财经
大学
学术
文库

Shan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中经济熵增
的伦理规制

李红岩 | 著

3
时政经济出版社

山西财经大学学术文库



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中 经济熵增的伦理规制

李红岩◎著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中经济熵增的伦理规制 / 李红岩著. —北京: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15. 12

ISBN 978 - 7 - 5095 - 6562 - 9

I. ①历… II. ①李… III. ①经济伦理学 IV. ①B82 - 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308834 号

责任编辑: 张振中

责任校对: 张 凡

封面设计: 张立娟

版式设计: 兰 波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

URL: <http://ckfz.cfeph.cn>

E-mail: ckfz@cfeph.cn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社址: 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甲 28 号 邮政编码: 100142

发行处电话: 010 - 88190406 财经书店电话: 010 - 64033436

北京厚诚则铭印刷科技有限公司印刷

787 × 1092 毫米 16 开 11.25 印张 184 000 字

2015 年 12 月第 1 版 2015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定价: 26.00 元

ISBN 978 - 7 - 5095 - 6562 - 9/B · 0031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本社质量投诉电话: 010 - 88190744

打击盗版举报电话: 010 - 88190492、QQ: 634579818

前 言

今日中国，正处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道德观念剧烈嬗变及其相互作用的特殊历史发展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伟大实践，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但同时也凸显了“经济熵增”问题及其不良社会影响。本书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的价值观为指导，主张通过“伦理规制”消除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促进社会经济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地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本书提出并详细论证了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中的经济与伦理。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客观本质及其发展规律，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指导人们认识经济社会和改造经济社会的伟大认识工具。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有机体理论，以人的发展为主要线索、以人类实践活动为现实内容，清晰展现了人类社会的整体结构和各种社会关系动态展开的历史面貌。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辩证关系的原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辩证关系的原理，显示了社会经济与伦理道德两者内在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客观普遍性，从而为我们研究和讨论经济熵增与伦理规制及其相互关系提供了坚实的哲学基础。

本书提出并详细论证了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中的经济熵增。世界是从有序、和谐走向无序、混乱，还是从无序、混乱走向有序、和谐，这是一个自然观问题，也是一个历史观问题。能量守恒定律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然科学基础，孤立封闭系统的熵增原理以及耗散结构理论是我们正确认识“经济熵增”问题的科学依据。经济熵增，是指社会经济系统运行中，偏离应有社会发展目标，在制度、组织、政策和环境能源等方面存在的功能失调、机能衰退、秩序紊乱现象。依据社会有机体理论，从不同层级经济主体的角度来看，经济熵增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宏观层面政府治理中的经济熵增、中观层面企业经营中的经济熵增、微观层面个体经济交往中的经济熵增。在不同层级各个经济主体的现实活动中，经济熵增问题又普遍存在

于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等物质资料生产和再生产得以进行的各个环节。

本书提出并详细论证了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中的伦理规制。提出经济熵增问题并寻求应对策略，意在借助这样一个新的理论分析框架，从新的角度观察社会经济问题，在尊重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更好地认识和利用社会经济规律，推动社会经济“合规律性”、“合目的性”地良性发展。面对“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困境，本书主张“伦理规制”应对策略，这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社会有机体理论的理性选择。伦理规制，就是运用社会舆论、传统习惯、内心信念、价值教育和制度建设等手段，影响政府、企业和个体等经济主体的市场行为，正确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利益关系。伦理规制的社会作用，体现在规制政府调控的价值取向、规制企业经营的伦理精神、规制个体行为的道德选择。在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中，伦理规制是自律与他律的统一，是外在伦理规范与内化道德精神的统一，是伦理道德理论与伦理道德实践的统一。

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社会有机体的全面发展观，我们主张经济运行机制的全面、系统控制观。它不仅要求将人看作是“经济人”，而且同时要求将人看作是“政治人”和“伦理人”。人不仅有自己的物质生活需要，而且有自己政治生活、文化生活的需要。人们进行经济活动，不仅有自己的物质利益动力，而且有自己政治思想动力和文化价值动力。因此，通过市场、政府和伦理三大调控机制，人类各种利益之间的协调是能够实现的。问题的实质在于，三大调控机制的相互协调（而不是相互代替或相互排斥）使我们不但有必要、而且有可能对抗混乱，对抗无序，对抗贪污腐败，对抗资源浪费，对抗环境污染。总之，良好的市场控制机制、政府控制机制和伦理控制机制及其相互协调，能够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最佳结合，从而不断克服经济运行中的熵增问题。这是作者内心深处的良好愿望，也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

目 录

1 绪论	1
1.1 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	1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4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16
1.4 研究目标和主要内容	21
2 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中的经济与伦理	23
2.1 社会有机体及其经济与伦理	23
2.2 社会有机体中的经济熵增	31
2.3 社会有机体中的伦理规制	40
3 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中的经济熵增	52
3.1 宏观层面：政府治理中的经济熵增	53
3.2 中观层面：企业经营中的经济熵增	72
3.3 微观层面：个体交往中的经济熵增	92
4 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中的伦理规制	111
4.1 宏观层面：政府治理中经济熵增的伦理规制	112
4.2 中观层面：企业经营中经济熵增的伦理规制	128
4.3 微观层面：个体交往中经济熵增的伦理规制	142

5 结论	155
5.1 研究的创新点	155
5.2 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157
参考文献	158
后记	174

1 绪 论

今日中国，正处在经济体制深化改革和道德观念剧烈嬗变及其相互作用的特殊历史发展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伟大实践，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但同时也凸显了“经济熵增”问题及其不良影响。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的价值观为指导，通过“伦理规制”消除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促进社会经济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地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为此，首先应该从总体上明确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回顾国内外研究现状，提出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把握研究目标和主要内容。

1.1 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

1.1.1 研究背景

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促进了社会财富的积累，中国三十多年的经济增长是世界经济史上极为罕见的现象，使占全球 1/5 的人口在三十多年时间里从解决温饱问题走向构建小康社会。然而，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资源能耗过高、贫富差距拉大、社会保障水平落后、环境破坏、食品安全失控、金融危机、官员腐败等问题。中国单位 GDP 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 2.2 倍，经济增长成本

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25%^①。产能过剩问题也很严重：2012 年，中国钢铁行业产能过剩 1.6 亿吨以上，钢铁产能利用率仅为 72% 左右；水泥产能过剩超过 3 亿吨，占总产量的 15% 左右；有色金属的产能利用率已由 2007 年的 90% 降至 65% 左右；电解铝氧化铝产能利用率均不到 80%；多晶硅产能利用率目前只有 50% 左右；不仅传统产业产能过剩，风电设备、太阳能及光伏等新兴产业也面临较大过剩压力，风电设备产能利用率低于 60%^②。2007 年 11 月至 2012 年 6 月，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 643759 件，结案 639068 件，给予党纪政纪处分 668429 人，涉嫌犯罪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24584 人，年均查办违纪违法案件 12 万余件^③。社会保障水平（社会保障支出占 GDP 比重）的城乡差距比较显著：1990 年至 2009 年之间，社会保障水平城乡之比平均为 8.03:1，最高曾达到 15.88:1，人均社会保障支出城乡之比平均为 73.52:1，最高曾达到 137.63:1^④。经济转型还带来了许多道德失范和道德缺失现象，人们常常被自私、虚荣、嫉妒、仇恨、贪婪和背信弃义等不道德的情感所包围，例如食品行业的道德缺失、医疗行业的红包潜规则、仇富现象、郭美美事件、小悦悦案、彭宇案等。人们普遍感觉到中国市场经济缺乏应有的道德信仰和伦理精神。

经济伦理是社会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的伦理维度（它意味着经济活动、经济行为应该符合伦理价值和伦理判断），亦有人称之为符合伦理价值、伦理判断的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⑤。经济伦理是指导经济主体行为的伦理价值观。社会经济高速发展带来的负效应即是经济熵增。“熵”表示变化的容量，最初由德国物理学家鲁道夫·克劳修斯（R. Clausius）提出。它是一个物质系统中能量衰竭程度的量度。“熵”指系统内部粒子混乱程度或无序程度。系统内部越混乱、越无序，熵值越大；系统越有序，熵值越小。热力学第二定律即熵增定律指出：“一个孤立系统的总混乱程度即熵永不减少。”换句话说，物质世界的状态总是自发地转变成无序，从“低熵”转变到“高熵”。事物发展有一种自动趋向无序的属性，最终达到最无序的平衡态，此时系统的熵值最大。熵增，就是熵值增加，也

① 陈剑：《包容性增长与中国的发展转型》，《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2（2）：13。

② 张卓元：《中国经济转型：从追求数量粗放扩张转变为追求质量提高效率》，《当代经济研究》，2013（7）：3。

③ 燕继荣：《腐败治理何以不力：探索与争鸣》，2013（2）：6。

④ 赵晓芳：《社会保障碎片化：危害、成因与弥合路径》，《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13（2）：69。

⑤ 强以华，杨海军：《论经济伦理的内涵和本质》，《道德与文明》，2013（4）：103。

就是体系无序度增加的过程。熵增原理告诉我们,如果一个系统是开放系统,那么熵值有可能不增加,而且有可能减少。因此为了维持系统的存在和发展,必须不断地输入能量和物质,以维持系统的能量耗散。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中,除了资本、技术、劳动力、土地、法律、制度等市场及政府管制要素外,迫切需要加入伦理的能量,以维持经济系统的有序发展。道德是市场经济存在的现实基础,是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价值指引。因此,如何克服中国经济运行中的经济熵增,保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是经济伦理研究的重要课题。具体来说有三个问题:一是我们以什么样的经济伦理理论认识中国经济运行中的熵增问题;二是中国经济运行中熵增的表现及其原因是什么;三是我们如何减少熵增。

1.1.2 研究意义

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中经济熵增的伦理规制研究,就是要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深入探讨社会经济运行中经济熵增的伦理规制问题。该研究体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本质,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伦理本质。深入研究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中经济熵增的伦理规制问题,具有以下三方面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1) 深入研究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中经济熵增的伦理规制问题,有利于拓展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视野,丰富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内容。马克思《资本论》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经典著作,不仅因为它揭露了资本家剥削的秘密、批判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而且还因为它揭示了劳动异化的秘密、批判了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伦理正当性。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经济熵增的伦理规制,同样关乎社会主义本质。经济熵增影响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物质财富的增长问题,伦理规制则不仅影响社会财富分配的公正问题,而且直接影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秩序。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不仅表现在理论概念的逻辑推演,而且更应该体现在对现实问题的关怀。辩证唯物主义是实践的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同样是实践的唯物主义。

(2) 深入研究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中经济熵增的伦理规制问题,有利于全面准确地把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谐、有序、可持续发展提供伦理维度。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公认的辉煌成

就，但同时也出现了令人困惑的经济熵增问题。面对经济熵增的道德困惑，有人提出了“爬坡论”，有人提出了“代价论”，有人提出了“二律背反论”，似乎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必然带来道德堕落。与此根本不同，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经济与伦理是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有机整体。如实提出并积极应对经济熵增问题，就能够消除经济发展中的无序、混乱和冲突，从而使得社会经济发展不仅是“物”的增长，同时是“善”的积累。

(3) 深入研究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中经济熵增的伦理规制问题，有利于构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伦理价值观，丰富伦理规制的理论研究内容，指导伦理规制的有效社会实践。历史唯物主义坚持历史唯物论，也坚持历史辩证法。“我承认总的历史发展中是物质的东西决定精神的东西，是社会的存在决定社会的意识；但是同时又承认而且必须承认精神的东西的反作用，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反作用，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①。在经济关系复杂化、价值冲突多元化的时代背景下，合理正当的伦理规制，能够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谐、有序、可持续发展提供伦理辩护和道义支持。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1.2.1 国外研究现状

(1) 古典经济伦理理论

自有人类经济活动以来就产生了经济伦理。古希腊哲学家德谟克利特就已经系统论证了经济生活中智慧、公正、勇敢、节制的传统美德，亚里士多德《尼各马科伦理学》则较为全面地讨论了人们经济生活中什么是幸福、什么是德性等问题。近现代的经济伦理思想主要在政治经济学的范围内展开。亚当·斯密是融合经济学理论与伦理学思想于一体，明确提出并系统论述经济伦理思想的集大成者，是古典经济学开创时期经济与伦理问题的基础性经典阐释。斯密认为，国民财富积累的秘密在于个人对自身利益的追求，社会利益和个人利益是高度相关的，人们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能增进社会福利，协调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关键是“看不见的手”——市场机制，这其实就是经济运行的最佳秩序原理。他

^①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4，300。

认为,每一个从事经济活动的人虽然都是自利的,但利己主义并不是市场经济的基本道德准则和应有的伦理秩序,“互利”才是市场经济的最基本道德准则和应有的伦理秩序。“我们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师和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自他们自利的打算”^①。但是斯密认为“经济人”自利的本能并不排斥人类共有的同情天性:“尽管人具有自私自利的本性,但这个人的天赋中总是明显地存在着这样一些本性,这些本性使他关心别人的命运,把别人的幸福看成是自己的事情,虽然他除了看到别人幸福而感到高兴以外,一无所得,这种本性就是怜悯或同情”^②。这种情感是人性中先天的“原始情感”,不需要通过后天的实践来证明,而且决不只是品行高尚的人才具备这种“原始情感”,即使是罪犯也不会全然丧失同情之心。这段话反映了斯密二元人性论的立场,即人有两面性,人既有“利己”心一面、又有“利他”心一面。斯密于1759年发表的《道德情操论》中阐述的核心问题是具有“利己”心和利己主义倾向的个人怎样节制自己的情感和行为,尤其是如何控制自私的情感和行为,以便建立一个有确定行为准则的理想社会。“一个人绝不应当把自己看得比其他任何人更为重要,以致为了个人私利而伤害或损害他人。以损害他们利益来增进自己利益的不正当行为,是天理不容的。”斯密第一次把个人“自利动机”系统地、清晰地纳入经济学的规范分析框架之中,并对“经济人”的行为如何通过市场机制导致社会财富创造的经济伦理机制进行了经济学的证明。但斯密的经济伦理思想有其历史局限性,它是立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合理的”这样一个假设前提的基础之上的,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完美的,适应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伦理道德观也是完善的。斯密的经济伦理思想论证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合理性和永恒性,其目的是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寻求伦理原则和建立伦理秩序。斯密的经济伦理思想以历史唯心主义作为指导原则,“一个人的各种官能是用来判断他人相同官能的尺度。我用我的视觉来判断你的视觉,用我的听觉来判断你的听觉,用我的理智来判断你的理智,用我的愤恨来判断你的愤恨,用我的爱来判断你的爱,我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其他的方法来判断他们”^③。

“经济伦理”一词由马克思·韦伯在《世界宗教的经济伦理》中率先提出。

① (英) 亚当·斯密, 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 上卷, 郭大力等译, 商务印书馆, 1974. 14.

② (英) 亚当·斯密, 道德情操论, 蒋自强等译, 第2版, 商务印书馆, 2003. 5.

③ (英) 亚当·斯密, 道德情操论, 蒋自强等译, 第2版, 商务印书馆, 2003. 18.

尽管有人认为韦伯的经济伦理思想实际是宗教伦理思想,但在韦伯的时代,宗教、政治与伦理没有分家,探讨伦理离不开对宗教、政治的分析。宗教与伦理密不可分,是调节世俗世界尤其是有宗教信仰传统国家人们世俗生活的道德规范。韦伯充分肯定和极力推崇精神动力对政治经济制度和社会发展的独特作用。为什么近代资本主义文明最早发生在西方?通过与东方国家中国、印度的比较,他认为,不是科学技术、繁荣的商业贸易等资本主义发展所需的物质基础造就了资本主义精神,而是新教伦理创造了资本主义精神,这种精神道德的力量比单纯鼓励资本积累更为重要。新教伦理是资本主义发展及西方近代文明产生的伦理动因和精神基础。“仅当财富诱使人无所事事,沉溺于罪恶的人生享乐之时,它在道德上方是邪恶的;仅当人为了日后的穷奢极欲、高枕无忧的生活而追逐财富时,它才是不正当的。但是,倘若财富意味着人履行其职业责任,则它不仅在道德上是正当的,而且是应该的,必须的”^①。对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萌发的新教伦理尤其是加尔文教的入世禁欲主义,韦伯认为,“在一项世俗的职业中要殚精竭力,持之不懈,有条不紊地劳动,这样一种宗教观念作为禁欲主义的最高手段,同时也作为重生与真诚信念的最可靠、最显著证明,对于我们在此业已称为资本主义精神的那种生活态度的扩张肯定发挥过巨大无比的杠杆作用”^②。

(2) 功利主义理论

经济伦理中处于支配地位的道德理论是以边沁和密尔为代表的功利主义。有学者认为,与康德的义务论相比,边沁的功利主义对企业伦理建设有重大指导作用,例如,在企业做出决策的过程中应考虑多数人的利益,而不仅仅是服务于少数人^③。功利主义强调人们行为的“后果”,即后果的好坏是判断行动对错的唯一标准,如果不与其后果联系起来,行动本身是无所谓对错的。与利己主义只关心行动者本人最大利益不同,功利主义的伦理主张是:一个行为是正确的,当且仅当它使社会善最大化了,或者说,它促进了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行为按照有助于促进幸福的程度而是正确的,按照其有利于产生不幸福的程度而是错误的”^④。行为的道德性是按照促进幸福的程度来衡量的。现实中的个体有时按照

① (德) 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郑志勇译,江西人民出版社,2010,149。

② (德) 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郑志勇译,江西人民出版社,2010,159。

③ Andrew Gustafson. In Defense of a Utilitarian Business Ethic. *Business and Society Review*, 2013, 118 (3): 325 ~ 360.

④ John Stuart Mill. *On liberty and other essays*. 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137.

功利主义来思考、评价和做出行动,但很少有人会说他们总会这么做,或者从不这么做。这就表明,对后果的考虑的确是主体道德思考的一个重要维度。这种结果评价是有积极意义的,许多情况下我们需要从结果的角度评价经济运行的状态,一个科学的评价体系要保持对结果的敏感。但是,功利主义将后果看作是道德考虑的唯一因素,这种道德观是有巨大争议的。其不关心人本身,只关心效用总数、不关心效用分配,忽视了过程公正,忽视了分配平等。从功利主义的观点来看,善优先于权利,“善”作为最高目的是压倒一切的。为了整个社会的更大利益,即使侵犯一部分人的权利也是允许的,也是符合功利主义道德的。但对于像诺齐克、德沃金等自由主义理论家来说,个人权利是非常重要的。他们反对以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的方式来促进另一部分人的利益,即使这样做是以社会整体的名义。因此,功利主义还忽视了人与人之间的差别。

与功利主义相似,新福利经济学将福利视为效用或商品的占有,仅仅依赖效用信息,坚持价值中立,运用狭隘的帕累托最优原则评价社会的运行状态。但阿罗不可能定理已经证明了不存在一个从个人偏好推导出社会偏好的社会福利函数,仅仅考虑个人效用问题是远远不够的。排除了对于公平、正义等效率之外的其他问题的考虑,只重效率,而很少关注公平的问题。福利经济学是功利主义在经济学领域大放光彩的典型体现。新福利经济学遭到了福利经济学的集大成者阿玛蒂亚·森的批评,认为社会福利函数排除了社会伦理、道德观念等价值因素。

(3) 现代自由主义正义理论

在批判功利主义论证逻辑的基础上,罗尔斯继承并发展了自由主义和契约论的思想传统,构建了他的正义理论。《正义论》是现代自由主义的巅峰之作,是对美国20世纪五六十年代社会正义、基本人权、资源的公平分配即贫富悬殊等问题的回应。罗尔斯对作为公平的和正义的两个原则(公平机会原则和差别原则)进行了理论证明,认为正义是判断社会制度合理性的首要价值,正义的主题和关键在于社会的基本结构,即社会主要制度如何分配基本的权利和义务,以及如何分配由于社会合作所产生的各种社会利益。罗尔斯的公平正义实际上是主张保护弱者的权利,社会地位与经济不平等存在的合理性在于,“除非对一些或所有社会基本善的一种不平等分配有利于最不利者”^①。他强调社会的基本善,即无

^① (美)约翰·罗尔斯. 正义论. 何怀宏等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8. 292.

论每个人的合理生活计划是什么，对他们都有价值的事物，包括自由和机会、收入和财富、自尊的基础等。这些“社会基本善”不同于自然的基本善（如健康、精力、理智及想象力等），前者受社会基本结构的控制和影响。罗尔斯正义理论的特点是它的高度抽象性，原创状态的设计和正义原则的选择过程完全祛除了它的历史属性，是一种思维的试验和理性的思考方式。正义论是以个人利益为出发点的，将个体剥离了社会属性放置于原初状态中，人被简化为被一系列条件限制了的原子化的无差别的理性个体。而且其把正义局限于政治范围内，个人自由权利的实现集中在政治领域中，忽视了人际差异和社会善的要求。罗尔斯的正义原则虽然属于理想状态的理论，却和我们的日常正义信念普遍相关的。它为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合理安排提供了指导原则，并为评价现实制度提供一个标准。如果这种制度违背这一观念而又没有充足的理由就被视为不正义的。当前中国社会的很多制度违背了罗尔斯的正义原则，例如户籍制度造成的城乡二元差距、农村社会保障的缺失、教育资源差别配置、公务员社会保障的特殊待遇等。这些非平等正义的制度设计限制了个人自由的发挥，降低了经济运行的效率。“某些法律或制度，不管它们如何有效率和条理，只要它们不正义，就必须加以改造或废除”^①。

由于罗尔斯分配正义论的差别原则必然使其倾向于加强政府的职能，其遭到了权力至上主义学者的抨击。诺齐克的理论就是讨论国家的性质和功能的基本理论，对国家的合法性和道德依据做出论证，最终捍卫的是组成国家的公民的个人权利。罗尔斯和诺齐克的冲突涉及理论与实践中的一个尖锐问题：是为了达到经济方面的平等而牺牲某些人的政治自由的权利，还是为了个人独立的政治权利及自由的完善而保留某些不平等的社会现象。诺齐克认为，个人权利是不证自明的，而国家权力的性质和范围则需要证明，“个人权利为国家留下了多大活动余地”^②。最弱意义上的“守夜人”式的国家才是唯一正义的国家，其他任何对社会和经济生活进行干预的国家都不能得到合法性的证明。罗尔斯“分配正义”的国家往往成为国家扩大功能、侵犯公民权利的主要理由。国家不应该用强制手段迫使一些公民帮助另一些公民，也不应禁止人们从事推进他们自己利益或自我保护的活动。与罗尔斯关注政治领域的权利（Right）相比，诺齐克用法律意义

① （美）约翰·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3.

② （美）罗伯特·诺齐克，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何怀宏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1.

上的权利 (Entitlement) 将权利从政治领域扩展到经济领域。他坚定地站在康德的立场上主张将个人权利作为人们行为的道德边界约束, 以此来保障人们的个人权利。但其自由至上主义虽然捍卫了权利的内在重要性, 却忽视了权利践行的结果, 忽视人们自然禀赋的不同以及不平等的社会地位造成的巨大不平等。例如市场失灵的出现, 如果固守个人权利不可侵犯的重要性, 没有任何外在力量予以弥补, 那市场经济自由发展造成的贫富差距将越来越大, 践行诺齐克的原则必然存在着实质性的不平等。如果社会处境最不利者的生存状况得不到改变, 保障个人权利在社会底层来说将是空谈。

(4) 阿玛蒂亚·森的经济伦理理论

阿玛蒂亚·森重建了经济学的伦理维度。在其代表作《伦理学与经济学》中, 他指出经济学可以通过更多、更明确地关注影响人类行为的伦理学思考而变得更有说服力^①。他批评了主流经济学的两种代表性理性观: “选择的内在一致性”和“选择的外在一致性”。认为他们忽略了信仰、承诺等道德因素也可以成为人类行为的构成要素, 在自我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之外还有集体理性。新制度经济学家曼瑟尔·奥尔森在《集体行动的逻辑》里证明了这点, 即个人理性不一定导致经济理性, 相反, 以古典经济学的自利假设来说, 个人非理性才会导致集体理性。阿玛蒂亚·森认为, 必须看到人类动机的多元性, 人们的行为不仅仅是纯粹利己, 也不是纯粹利他, 而是以某种方式结合在一起。个体所秉承的价值观、正式和非正式制度等都深刻的影响着经济活动。经济学与伦理学需结成联盟, 互助其发展。在批评功利主义、新福利经济学、罗尔斯正义论和诺齐克权利论的基础上, 阿玛蒂亚·森提出了“可行能力”作为评价“平等”的指标。可行能力视野中的经济正义关注以“自由”为核心的可行能力的不公平。贫困和饥荒不能归因于经济发展水平低、财富没有实现最大化和粮食供给不足等因素, 而是这些弱势群体的可行能力被剥夺了。如何保障弱势群体的实质性自由与功能性活动是阿玛蒂亚·森可行能力经济正义关注的核心。

当代国外学者近几十年关注的一个前沿热点问题是“利益冲突”(Conflict of Interest)^②。社会资源的基本特征是稀缺性和有限性, 人们设计的社会资源分配

① (印度)阿玛蒂亚·森:《伦理学与经济学》,王宇等译,商务印书馆,2000,15。

② Tanzi Vito, Ludger Schuknecht. Reconsidering the Fiscal Role of Government: The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Papers and Proceedings, 1997, 87 (5): 164-168.

机制又很难保证其公正合理,所以在现实生活中就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利益冲突^①。近年来,欧美国家对利益冲突的研究非常流行,也受到发达国家政府部门的关注,美国政府设有“政府伦理署”^②,加拿大政府也很重视^③,世界经合组织也对此表示关注^④。国外学者具体讨论了以下问题:第一,利益冲突的概念含义。加拿大政府认为,所谓利益冲突就是指“公职人员所代表的公共利益与自身所具有的私人利益之间的抵触、冲突与侵害”^⑤。也有学者概括为“以权谋私”^⑥、“特殊利益”^⑦。第二,利益冲突的危害。有学者对利益冲突的表现形式和社会危害做了深入探讨^⑧,有人提出利益冲突是官员腐败的根源^⑨,有人把利益冲突看作是伦理困境^⑩,有人则认为是公务人员个人利益与公共职责之间的冲突^⑪,有人把利益冲突视为丑闻事件^⑫。第三,利益冲突的政策应对。有学者认为利益冲突会影响政策过程^⑬,也有学者认为处理好利益冲突“有利于实现公共政策目标”^⑭。

-
- ① April Hwjka - Ekins. Ethics in In - service Training. Terry Cooper. Handbook of Administrative Ethics. New York; Marcel Dekker Inc, 2000. 91.
- ② Mauro, Paolo. Corruption and Growth.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5 (110): 681 ~ 712.
- ③ OECD. Managing Conflict of Interest in the Public Service; OECD Guidelines and Overview. OECD, 2003. 24.
- ④ Rabin J. Encyclopedia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public policy. New York; Marcel Dekker Inc, 2005. 103.
- ⑤ Andrew Stark. Conflict of Interest in American Public Lif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17.
- ⑥ David M. Conflict of Interest: Encyclopedia of Applied Ethics. San Diego; Academic Press, 1998. 202.
- ⑦ OECD. Managing Conflict of Interest in the Public Service; OECD Guidelines and Overview. OECD, 2003. 24.
- ⑧ Seumas Miller, Peter Roberts, Edward Spence. Corruption and Anti - Corruption; an Applied Philosophical Approach. Pearson Education Inc, 2005. 46 ~ 59.
- ⑨ MJ Mafunisa. Conflict of Interest; Ethical Dilemma in Politics and Administration. South African Journal of Labour Relation, 2003. 27 (2): 84.
- ⑩ Janos Bertok. Putting Conflict of Interest Policies into Practice; from Guidelines to Toolkit. ADB, OECD. Controlling Corruption in Asian and the Pacific. Malaysia, 2005. 86.
- ⑪ Ian Greene. Conflict of interest and the Canadian constitution: an analysis of conflict of interest rules for Canadian cabinet ministers [J]. Cana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1990 (2): 246 ~ 248.
- ⑫ J. Parick Dobel. The Realpolitik of Ethics Codes; an Implementation Approach to Public Ethics. In: H. George Frederickson de. Ethics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M. E. Sharpe, 1993. 161.
- ⑬ J. Jackson Walter. The Ethics in Government Act: Conflict of Interest Laws and President Recruiting.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1981 (6): 659 ~ 665.
- ⑭ Beth Rosenson. The Shadowlands of Conduct; Ethics and State Politics. Washington D. C; 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 2005. 91 ~ 93.